

# 人类基因工程图解

Mapping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艾伦·韦黑 著 美国富勒神学院 谢文郁 译

Allen Verhey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U.S.A.

## [英文提要]

The essay attempts to provide a religious and ethical reflection on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It imposes a question: Where shall wisdom be found regarding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In answering the question, the author examines several contexts in which the project has been proposed and supported, egnetic reductionism, Baconianism, liberalism, eugenics, and capitalism, and demonstrates that they are leading the project in destructive directions to human welfare. As an antithesis, the author explores a Christian way to redirect the project, whereby the image God in his creation, and concern for the nutrition needs of the world and human beings must provide the fundamental guideline in directing the project.

## 导论:从格雷格尔(Gregor)的庭院到人类基因图

这是一个大家耳熟的故事。它起于奥大利国内的一个庭院。这不是伊甸园,而是一个修道院的庭院。格雷格尔弟兄,一个奥古斯丁修士,在那里种植各种豆类植物。他出生于农民家庭,知道许多种植上的事。不过,在这庭院中他系统地有记录地了解遗传的规则。他把他的观察记载下来并出版,只是当时没人特别注意他。这世界还在打呵欠。那是1985年的事了。但故事还没完。

他不被注意的原因也许因为他是个修士;也许这世界还在小

看数学;也许是达尔文的理论的新近提出(1859)把人的注意力转移了。不管怎么样,在二十世纪曙光之际,人们开始醒过来并重视孟德尔的遗传观察的重要性了。他的著作被重新发现,出版,并被他人证实。他的遗传假设被称为原创,由此开创了历史。必须说,这不是一段令人愉快的历史。它很快就和优生学混在一起。科学,即使服从于某些更大的目示,它还是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热情。<sup>①</sup>

1953年,James Watson 和 Francis Crick 发现了DNA结构。当他们在—间小酒店庆祝他们的发现时,Crick 向在场的人宣布,他们刚刚发现了“生命的秘密”。<sup>②</sup> 这类语言在这些酒店里是习以为常的。渐渐地,人们也习以为常地用它来描述基因。它是生命的《圣经》;“人类之书”;“圣杯”。

这一发现和这类语言触发了由政府和公司资助的大规模的至今仍在进行的研究。这便是 HGP 故事,也称人类基因工程,也称圣杯工程。<sup>③</sup>

关于人类基因的知识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伴随而来的是力量。这正应了古老的培根等式:知识就是力量。问题在于培根等式的下一步能否被证实,即,知识和力量能否给人类列车带来福祺。我们看到,在这个小故事结束之际,我们已经拥有了知识(或至少有一些知识)力量力量(或至少有一些力量),但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我们该如何使用这些知识?我们该留用那一些力量?我们拥有知识和力量,但我们有智慧吗?谁有呢?从何寻找智慧?在

<sup>①</sup> 参阅 Arthur J. Dyck, “Eugenics in Historical and Ethical Perspective,” (“从历史和伦理的角度看优生学”),载于 John F. Kilner, Rebecca D. Pentz, 和 Frank E. Young 等编, *Genetic Ethics*《遗传伦理学》,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7年, 25-39页。

<sup>②</sup> 见 James D. Watson 著, *The Double Helix*《双螺旋》, New York: Atheneum, 1968年, 126页。

<sup>③</sup> 参阅 Walter Gilbert 著, “A Vision of the Grail,” (“圣杯的异象”),载于 Daniel Kevles 和 Leroy Hood 等编, *The Code of Codes*《密码之码》,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年。

这故事结束之时,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即,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智慧图。

尽管人类基因工程的成功,尽管 Crick 可以大谈“生命的秘密”,HGP 并没有找到智慧的基因,或那惧怕神的基因,即,古时圣者所言的智慧之始(箴言 1:7;9:10;约伯记 28:28)。

“但那里才能找到智慧呢?”面对人类基因工程,这个古老的问题鲜有人提问。约伯在很久以前就问过(约伯记 28:12)。这是不易回答的问题。他这一些事是不可测的,“向眼目遮掩”(约 28:21)。不过,他知道从他的朋友们之口所出的那些道貌岸然的智慧乃是真的愚昧。他还知道一些别的事情,如他所说,他知道神知道智慧之路,智慧是神“所定的”;当古人说信神[或惧怕神]是智慧的开始时,他知道他们是对的(箴言 28:23-28)。

我建议去圣经里寻找智慧。我想邀请读者记起那个开始于一个庭院中的故事,一起来从圣经的角度问一问人类基因图的意义,以此来设计工程把我们引向智慧。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主题,在圣经中找到智慧并以此指导基督徒去认识在遗传学中已经做了的和尚未做的事,进而能够“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神”(哥林多前书 6:20),也用人类基因来荣耀神。在我们去圣经中寻找智慧之前,我想先看看一些在我们文化中常被当作智慧的东西,考察一下我们文化对人类基因工程的定位方法,从而知道我们所处地位以及如何处理这新的知识和力量。

## 一、HGP 的文化定位

### 1. 遗传还原主义的定位

我们来考察一下我们的文化在人类基因工程上常用的语言。

它以智慧的面目出现,好像人类基因图是“生命的秘密”,或“密码之码”,或“人类生命图”。这类语言好像告诉我们,人类基因图的解读是了解人类生命的必要充分条件。我们不接受遗传还原主义,因它不是智慧,而是愚昧的方法。

Walter Gilbert 是遗传学的诺贝尔奖得主。他公开宣称,我们可以每一天都有一盘 CD 储藏我们个人的遗传密码。但他进而做出这样可笑的设想,即,我们可以拿着那 CD 并说“这是我”。<sup>①</sup> 这样的未来(按如此说法)我们不但不能要,且要拒绝。一个人不能还原为他的基因。有能力给基因定位和测定次序并不给我们“对古时训令‘认识自己’的最后回答”,如 Gilbert 所希望的。<sup>②</sup> 实际上,不但人体不能还原为基因,基因型也不能和显型相混。个人和人体都有其历史,而不只是遗传命定。

我们不用圣经也能认出遗传还原主义的漏洞。想一想这个问题:人类遗传工程要给什么定位呢?——不是给为人类个体;也不是给人体;甚至也不是给所谓的“人类基因团”(the human genome)。根本就没有“人类基因团”这种东西。人类基因工程本身就提醒我们,人与人的基因是不同的。工程的目的是公布两百人的平均或“几率”次序。这张图不是某个人或哪个人的。“人类基因团”有血型吗?是 A 型? B 型? 还是 AB 或 O 型? 我们能借助于染色体 9 来测验血型。但是,仔细看,我们看不到“人类基因团”的血型。我们看到的是“多样性是人类基因团——或真的有的话——的固有的不可分割的部分。”<sup>③</sup>

这种还原主义伴随着遗传决定论,并由此陷入自造的矛盾中。一方面,它否定人的自由,认为人类完全受他们的 DNA 所决定。

① 见 Gilbert 著,“A Vision of the Grail”,(“圣杯的异象”),96 页。

② 见 Jean Bethke Elshtain 著,《Who Are We?》(《我们是谁?》),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0 年,90 页,引用 Gilbert。

③ 见 Matt Ridley 著,《Genome》(《基因团》),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9 年,145 页。

另一方面,它又认为人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去控制他们的 DNA,他们的本性,和他们的进化的未来。<sup>①</sup>

我们不接受遗传决定论,并不是说我们放弃对遗传学的研究。我们反对的是这种说法,即,认为人类基因图足以基因困定位。我们注意到,面对人类基因工程所提供的知识,我们需要的是其他的“人类”图来指导我们。拒绝遗传还原主义和决定论并不需要什么大学问。但是,如不拒绝它们则我们无望于智慧。

## 2. 培根工程的定位

我们来看所谓的“培根工程”所提供的地图。<sup>②</sup> 培根工程把人类基因工程定位为“实践的”科学,并把它看作能“释放人对命运或必然性的依赖”。<sup>③</sup> 听起来还不错,也合现代人的口味。然而,这是愚人之路。

区分实践的和“思辨的”(或理论的)科学倒是可以接受的。阿奎那也这样做。不过,阿奎那认定一切知识都是“好的”。<sup>④</sup> 培根的区分则是要把“思辨的”科学当作“知识的孩童时代”。和“缺乏工作”而加以否定。<sup>⑤</sup> 西方文化从此跟随培根而推动某种特别形式的知识,即,科学这一带有荣誉性称呼的知识。就古典意义而言,理论(或思辨科学)提供了智慧以指导如何合适地使用实践科学。但在培根的处理中—包括受培根处理所影响的文化—我们去

<sup>①</sup> 参阅 Ted Peters 著, *Playing God? Genetic Determinism and Human Freedom*《扮演神? 遗传决定论和人类自由》,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年, xiii 页。

<sup>②</sup> 关于培根工程,参阅 Gerald McKenny 著, *To Relief the Human Condition: Bioethics, Technology and the Body*《人类境况的减轻:生物伦理学,技术和身体》,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年。

<sup>③</sup> 见 McKenny, 22 页。

<sup>④</sup> 见阿奎那的 *Commentary on Aristotle's On the Soul*《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评论》1.3;转引自 Hans Jonas 著, *The Phenomenon of Life: Toward a Philosophical Biology*《生命现象:走向哲学生物学》, New York: Dell, 1966 年, 188 页。

<sup>⑤</sup> 见培根的 *The New Organon and Related Writings*《新工具论和相关著作》, F. H. Anderson 编, Indianapolis: The Liberal Arts Press, Bobbs-Merrill Co., 1960[1620]年, 8 页。

哪里找这智慧呢?

现代思想会同意,如培根所认为的,知识之于人类福利必须“在人类普爱中完善和管理”,<sup>①</sup>但是,科学“自身不足以提供这样的人类品格以使之造福于人”。<sup>②</sup>HGP也还没有找到造福于人类的尺子。我们知道,我们痛苦的时候会有冲动本能地推动我们去做些什么以减轻痛苦,但它不会告诉我们去做什么。培根式的对技术的信赖告诉我们该去找最新的技术或最直接的工具来解除痛苦。培根工程只是给我们的冲动配以技巧,而非智慧。对于那指导人类福利或本能冲动的智慧,科学必须在别处找去。在哪找去呢?根据培根的处理,人如何能拥有关于它的“知识”?培根所鼓吹的“实践”知识包含了这一自信,即,它会赋予人类以“能力去征服自然的灾难和不确定性”,<sup>③</sup>去解决自然带来的烦恼和不幸,从而“给人类家庭带来仁慈”。<sup>④</sup>培根工程给人类带来的不仅是征服自然,而且也与自然对抗。在这工程里,自然秩序和自然过程没有自己的尊严;他们的价值被降低为只是对人有用。自然不能“自然地”服务于人类,反而是对人类的威胁,是一种统治和毁灭的力量。我们这个世界的过错和我们生活的失调都被归罪于自然,因此,自然不但可以,而且必须被控制。<sup>⑤</sup>技术于是成为可信赖的救主。

培根工程在遗传强化(genetic enhancement)上找到了一种自然表达。我们居住的自然即是让我们受苦的自然。人类的有限自我,即人类本性当然也是这自然的一部分,因此需要强化人类本性来解脱苦难。这样一来,我们就越来越不考虑(或分辨和维持)医治和强化之间的区别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强化技术的成功,如

- 
- ① 见培根,15页。  
② 见Jonas,1966年,195页。  
③ 见培根,19页。  
④ 见培根,29页。  
⑤ 见Jonas,192页。

Mark Hanson 所观察到的,“使人类受苦的范围扩展了。”<sup>①</sup>

认为技术必然给人类历程带来好处的信念看来是大有疑问的。对于人类基因工程的定位以及其运作方向来说,培根工程是一张有力的然而却是愚蠢的地图。我们还须在他处找智慧。

### 3. 在自由社会工程中的定位

我们也来看看“自由社会工程”。在这个道德多元的世界是,自由社会工程是要维护和平的。<sup>②</sup> 这听起来也不错。而且,这种说法在现代(和后现代)世界里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这一工程也是愚人之路。

因为人们在道德信念上的分歧,一个自由社会要求尊重每一个人的自主权,并且只要没有妨碍他人的自主权,每个人都应有空间按他的道德选择来行事。在多元社会中努力保持和平是理智的做法;同时,尊重每一成员的道德体系也是应该的。但自由社会工程的缺点是它的低调主义(minimalism),以及它未能公开承认(或干脆拒绝)这一低调主义。

它的低调主义有多种表现形式。自由工程不告诉我们什么是可追求的善,却告诉我们在追求善时的种种约束。通常地,它只注意这一约束,即,禁止任何对他人自由的妨碍。在它看来,自由乃是充分的道德原则。于是,它把立约关系(如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还原为契约关系。它对程序的强调,如强调“谁来做决定?”这样的问题,从而把道德的根本问题,如行为和品格问题,“要决定什么?”“应该根据什么美德来做决定?”等等在公共讨论中边缘化。

<sup>①</sup> 见 Mark J. Hanson 著,“Indulging Anxiety: Human Enhancement from a Protestant Perspective,”(在焦盼中:从新教立场看人类强化),载于 *Christian Bioethics*《基督教生物伦理学杂志》,八月,1999年;第五卷第二期,121-138页;125页。

<sup>②</sup> 参阅 Hans Reinders 对“自由主义条约”的处理,见 *The Future of the Disabled in Liberal Society: An Ethical Analysis*《自由社会中残疾人的未来:伦理分析》,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2000年,22-35页。

这种低调主义并没有错,错在它未被公开承认。于是,它能够搞乱并推翻道德生活和生活的道德性。比如,非两厢情愿的性关系是错的。但是,我们还该说一说什么是好的性生活。如果不让说,那么好的性生活就会被搞乱并被放弃。

当我们认为“生育权”就是充分原则时,我们就公开地把自我归结为一组器官能力,把生育归属于纯生理学和契约的事。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想一想替身母亲的尴尬处境:她们有时因契约而疏远她们的怀孕和生产的亲身经历;有时则因她们的亲身生育经历而离开所定的契约。

或者来看看我们在对待残疾人的公共道德上所表现出来的可笑明显不一致。一方面,我们支持他们融入社会和他们的平等自由。另一方面,我们却坚持一种防止残疾婴儿出生的生育权。这种生育自由对残疾人生命的消极态度怎么能长久维持社会对残疾人完全融入社会的承诺呢?<sup>①</sup>

人们常说,“增大自由(maximizing freedom)在道德上是清白的。这种说法很可笑。具有嘲讽意义的是,“增大自由”加强了我们的被奴役性。我们想扩大我们的选择范围,从而导致了相应的社会限制。<sup>②</sup>遗传技术为父母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比如,出生前的诊断,但同时也带来更多的社会限制。“什么?你知道你怀的小孩有那种病,你还是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现在倒要求来帮助这小孩?”当然,我们可以说出生前诊断是一种进步。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不是要去庆贺选择增加或自由增大,而是要问进步的意义。这校的问题涉及道德上的更根本的问题,这当然是自由工程不准备回答的。

<sup>①</sup> 见 Reinders, 65 页。也参阅 77-8 页。

<sup>②</sup> 比如,和死亡有关的技术使医生和病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时有选择,但这也“选择”成了社会限制。至少我们时常听到,“我们没有选择。”



还有这个讽刺:增大自由或增加选择有时带来的是抹消选择。比如,在增大自由的幌子下我们提供了安乐死这一选择,从而抹消了考虑他的生存对他人的意义的生存选择。在生育权的幌子下我们提供了不让先天缺陷婴儿出生的选择,却抹消了考虑这婴儿的生存对他人的意义因而需要我们的关怀这一选择。增大自由绝不是改变社会实践的充足理由,特别是涉及那些导致弱者更弱的改变。

以为自由是充分原则,而且增大自由在道德上是没有异议的,这种自信看来是需要反省了。对于人类基因工程的定位以及其运作方向来说,自由社会工程是一张有力的然而却是愚蠢的地图。我们必须在他处寻找智慧。

#### 4. 在生产完善婴儿工程中的定位

培根工程和自由工程合在一起扭曲了我们和我们后代的关系。因对自然的不信任而导致的技术信赖和对选择的爱好合在一起培养了一种新的“智慧”来做父母,即一种新的婴儿生产工程。我们因此被诱向认为我们的儿女乃是人类的成就而非神的礼物,乃是希望的基础而非我们在神里的希望的迹象。

很少人会认为小孩是他们父母的财产,他们父母爱怎样就怎样。当今的困惑乃来自一种看法,即认为父母有重大责任来造就完善的小孩,并在此基础上确保他们的幸福和成功。这样一来,我们就把小孩当作产品,当作人的和技术的成就。结果是,而且最后会要求,流产那些不合标准胎儿,为了我们的理想中的美好生活而忽视能力较差的新生婴儿,追求遗传技术来改善我们的小孩,等等。这样的工程最终只会把我们的选择局限于这两者之间:或完善小孩,或死的小孩。

但是,我们的小孩是生出来的,而不是制造的。<sup>①</sup> 他们是礼物,而不是成就。当我们说礼物时是要我们把我们的孩子看作和神有联系的。这个神通过耶稣为我们所知,被称为“阿爸”(Abba);他祝福小孩。天父的无边无际的抚养依然教导我们如何做父母,如何去爱那些不完全的。下贱的,以及平平常常的小孩。我们说这是礼物还包含着这层意思,这礼物怎么给我们,我们就怎样接受。我们不认为他们是产品,是成就,而是他们是怎样就怎样。小孩是给我们的,不是我们的选择,不在我们的控制下,他们并不一定如我们想要的,希望要的,或合于我们的选择的。他们是给与我们的,因而总是有一种独立性,独立于我们的理性选择。如果我们能把小孩看作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父母为了某种目的和计划而使用的工具,也就不难理解小孩乃是礼物这一说法了。<sup>②</sup>

对于人类基因工程的定位以及我们自己的再生产的运作方向来说,生产完善婴儿工程是一张有力的然而却是愚蠢的地图。我们必须在他处寻找智慧。

### 5. 在资本主义工程中的定位

在人类基因工程的发展中,我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它的发展不能脱离那推动工程的资金的作用。资本主义工程及其所提供的地图引导科学知识向市场产品的转变。<sup>③</sup> 那些最先在 HGP 中投资的国家,如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都指望他们的生物技术工业

① 参阅 Oliver O'Donovan 著, *Begotten or Made?* 《生还是造?》,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年。

② 关于父母和子女关系参阅 Sondra Wheeler 的“Contingency, Tragedy, and the Virtues of Parenting.” (“意外故事,悲剧,和父母道德”), 载于 Ronald Cole-Turner 编, *Beyond Cloning* 《复制的其他问题》, (Harrisburg, PA: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2001 年, 111 - 123 页。

③ 参阅 Julie Clague 的“Genetic Knowledge as a Commodity: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Markets and Consumers.” (“遗传知识作为日用品:人类遗传工程的市场和顾客”), 载于 Maureen Junker-Kenny and Lisa Sowle Cahill 等编的 *The Ethics of Genetic Engineering* 《遗传工程的伦理学》, *Concilium* 1998 年第二期; London: SCM Press, 1998 年, 3 - 12 页, 6 页。

能在商业运用上有可观的收入。开始时,因效率考虑而出现国际性的统筹合作研究。<sup>①</sup> 随后,当某些基因程序和某些疾病的关系确定后,为了确保在研究和产品开发上的投资,对生物技术公司的商业兴趣引导人们对基因程序的专利申请。<sup>②</sup> 于是,因为市场需要,统筹和合作让位于互相竞争和互相保密。

人类基因工程所提供的医学进步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成功的(商业化的)产品开发挂钩的。社会福利依靠于市场,医学目标内在地和商业目标相联。人类基因工程所带来的好处,商业的也好医学的也好,大都只为发达国家所享用,而且也大都局限在这些国家的相对富裕的人群里。所以,这些事都不是偶然的:研究的最多的基因是所谓的胞囊纤维基因(cystic fibrosis gene),每25个欧洲人就有一个人有这种基因。<sup>③</sup> 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是,那些雇佣人并提供健康保险的公司便会使用这些知识和能力服务于他们的经济利益,而把有病穷人的利益搁置一旁。

也许,我们相信有“无形的手”在指导市场走向有效率,并使全球平等化。也许,我们相信至少有一些好处留给穷人和经济上无力的人。不管如何,现在是反省的时候了。我们所看到的不足于维持公义,特别是全球公义。对于人类基因工程的定位以及我们自己的再生产的运作方向来说,资本主义工程是一张有力的然而却是愚蠢的地图。我们必须在他处寻找智慧以及公义。

---

<sup>①</sup> 见 Robert Mullan Cook-Deegan 著,“Genome Mapping and Sequencing,”(“基因团的定位和次序”),载于 Warren Reich 编, *Encyclopedia of Bioethics*《生物学百科全书》,修订版, New York: Macmillan, 1995 年, 1011 - 20 页, 1014 - 15 页。也请参阅 Karen Lebacqz 的“Fair Shares: Is the Genome Project Just?”(“公平分红: 基因工程公正吗?”), 载于 Ted Peters 编的 *Genetics: Issues of Social Justice*《遗传学: 社会公正问题》, Cleveland: The Pilgrim Press, 1998 年, 82 - 107 页。

<sup>②</sup> 参阅 Stephen Sherry 著,“The Incentive of Patents,”(“专利的动机”)载于 Kilner 编的 *Genetic Ethics*《遗传伦理学》113 - 123 页。

<sup>③</sup> 自由工程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是很明显的。新技术使消费者有更多的挑选。

## 二、从圣经的角度定位 HGP

基督徒从圣经的故事里寻找智慧。在那里,他们努力理解神,以及万物,包括人类基因团,和神的关系。在那里,面对人类基因工程,我们知道我们在什么位置上,并该往哪里走。

但我们要读哪一个故事呢? Francis Collins 是美国人类基因工程的主管。他一直提到耶稣的医病故事,并用它来引导我们把人类基因工程看作是一种门徒训练,即,“我们医治病人的努力的自然延伸”。<sup>①</sup>我认为这是很深刻的想法(我还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但它并不完全。因为它不完全,所以很容易与培根工程为伍。<sup>②</sup>我们需要完整的故事。理解力需要完整的故事。

但完整的故事是什么呢? 作为简要的回答,我们从开始,到中间,至结尾,并在其中寻找智慧。

### 始初……

始初有创世的故事。神是创造者,“天地的创造者”,包括人类基因团。人们或者同意创世的故事但认为创造过程要比七天长;人们或者不同意这个故事而不把创造,不管是哪一部分,归于神。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是不允许偶像崇拜的。神造的绝不是神。神不是光,也不是那些光;不是生产和再生产的自然能力,不是人争取自由和控制自然的能力,甚至不是生命本身。当我们在

<sup>①</sup> 见 Francis Collins 的“The Human Genome Project,”(“人类基因工程”),载于 John F. Kilner, Rebecca D. Pentz, 和 Frank E. Young 编, *Genetic Ethics*《遗传伦理学》,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7 年, 25 - 39, 95 - 103 页, 和 95 页。

<sup>②</sup> 比如,见 Francis Collins 著。“Shattuck Lecture - Medical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Shattuck 的演讲—人类基因工程的医学和社会后果”,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999 年(第 341 卷,第一期), 28—47 页, 28:“科学家想要人类遗传的地形图,认为这样会引导他们走向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洞察力,并进而走向公共利益。”

培根工程中对技术包括遗传技术那种过分的偶像式的指望时,我们以为是智慧的。当我们跟着培根把自然过程本身神圣化,好像“自然母亲”就是神时,我们以为是智慧的。当我们在所谓的父母工程中把我们的儿女当作偶像,并视之为未来希望的基础而不是在神里的希望的迹象时,我们以为是智慧的。但它们只是偶像。我们必须离开偶像。

有人同意这个故事却认为创造的道路还包括进化的过程;有人反对这个故事却认为神造的世界,包括人类基因团,并没有什么不好。但这个故事不允许二元论。“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世记 1:31)光和诸光都好。生产和再生产的能力都好。人类的自由能力和自然的神秘性乃是神的好礼物。而生命,就其有限并对神的倚靠来看,也是好的。神造的都是好的。然而,当培根工程要我们视自然为敌人,视我们的有限性为缺陷时,我们以为有智慧。但这不是的。我们必须知道,神创造了好的世界。

在这个始初,神说按神的形象造了人(创世记 1:26—27)。在巴比伦的创世说里马杜克(Marduk)是从金谷(Kingu)这个被打败的坏的神的血中造人的,并使人侍候诸神(或他们在巴比伦的代表)。犹太人的故事则不同。它说神不是从坏神的血中造人,而是把人造成有神的“形象”;不是被奴役而是被给与自由的;不是做奴隶而是去管理的。人们尽可以不认可这个故事,而是去认为男人可做奴隶女人只是有用。但是,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必须尊重人的尊严,反对任何这类做法,包括那些优生的做法,即把人归结为他们的用处,服务于我们的工程,不管这工程是父母的还是科学的。

借用一下这个说法:一个雕像乃是一个“形象”的形象。按世上君王的做法,他们在他们的国中树立雕像;这象征着他们的统治权威。神把人造的有“神的形象”,并让他们在被造物中作为神的统治的象征。他们通过统治来表现神的主权。因此,最好的统治

是要去荣耀神的统治,去彰显神的做法。作为神的形象就是要去听神的呼唤以彰显神的做法。

我们如何在人类基因工程中去彰显神的做法呢?<sup>①</sup> 在创世记的故事里有许多启示。如果我的读法是对的,作为神创造者的形象所意味的一些事情恰好被培根工程所形成的科学忽略了。它有这样的意谓;当我们看见这创造和这遗传学时,对自己说,“神啊,那是好的。”意味着,我们先是惊叹,敬畏,然后去赞美这 DNA,这被造的精美结构。意味着,我们对自然的认知不是一种掌握,而是认识那被造的自然和被造的人类本性;于是,我们就不会对它有恐惧以及由此而来的控制欲望。真的,如无对神的工作的敬佩和在创造主面前的敬畏,培根工程会把人类进步下降为技术进步并使我们的远离创造,远离我们的本性。我们必须认识清楚,我们不只是去控制,根本地是要去赞叹和赞美。<sup>②</sup>

如果我读对了,作为神的形象还意味着第二件事,这也是一件几乎被忽略了的事。<sup>③</sup> 它意味着可以休息一天,歇一会,去玩一玩。安息日是休息和玩的日子。在这日子中我们可以安静在神里头,他是可以信赖的值得称颂的。由此我们就拒绝把我们当作制造者和设计者;拒绝把我们的生存归为只是不断工作没有快乐;拒绝把我们的道德生活下降为只是有用,只关心结果。我们的方向不仅是向着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好,而且根本地是要向着那我们所

<sup>①</sup> 这当然是一个讨论了很多的话题。讨论的焦点往往是该把我当作“办事员”还是“参与创造者”。“办事员”通常是指维护和保护创造物,而“共创者”则强调有自由去干涉自然,或纠正和“恢复”自然。参阅 James J. Walter 的“Theological Issues in Genetics,”(“遗传学的神学问题”),*Theological Studies*,《神学研究》,1999年三月刊。坦白来说,如果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问题,上述讨论不在点子上。“办事员”和“共创者”都是对神负责的。一个向神负责的好的办事员是创造性的,而一位负责的共创者则会去维护已存的好东西。问题在于,我认为,不管我们是办事员还是共创者,我们是让遗传还原主义,培根工程,自由工程,父母工程,和市场工程等的“智慧”来引导呢?还是让我们的这个故事的智慧来带领。

<sup>②</sup> 这一点在二十五年前就由 Bernard Haring 有力地指出来了。见 *The Ethics of Manipulation*《操作的伦理学》,New York:Seabury Press,1975年。

<sup>③</sup> 但 Haring 没有忽略它,50页。

接受到的好,并在其中欢喜快乐。这种制造完善小孩工程的智慧不同,它要我们去设计我们的小孩。

作为神创造者的形象还意味着这第三件事。这件事倒没有被忽略,即,人的创造性在创造时被给了人。人被造后被称为在世上行使主权。这一点在我看来也包括人类基因团,但不包括“自然母亲”,因她其实就是神。神所造的不是神。人的创造性和控制力是对神的回应和模仿。神的统治不像某些暴君那样对他的臣民称王称霸,因而他不会对那些仿效他的人称王称霸。(参看马可福音 10:45-46)我们不会失去能力和主权,但我们要知道“主权”是要服务于神,服务于他人,和服务于世界的。

第四点是,在神的形象里我们是社会动物。造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的生活就是一个分享和不断自我给与的故事。是神让我们具有社会性,使我们既在关系中也服务于关系。我们在创世的故事可以读到这一点,神在造人的时候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记 1:27)。自由社会工程的智慧告诉我们,人是个体的,人的关系只是契约。我们的关系不能归结为一组自主个体间的契约关系。我们仿效神的自我给与,肯定他人的存在并关心他们。我们必须学会对自然关系的尊重。

如果神把我们造成社会动物,那么第五点就是,神把我们造成包容的自我(embodied selves)。我们是作为包容的自我来模仿神的。始初,神把一口气吹给尘土而造了 nephesh“一个生命”(创世记 2:7),正因为是 nephesh,作为生命体,人是“肉体的”(basar)。这里没有二元论的位置,好像灵魂和身体是两件事而非一个整体。遗传还原主义的智慧把我们自我归为我们的基因;培根工程的智慧要我们把自然当作敌人来控制。我们的创世论认为我们是包容的自我,不能还原为只是身体,生物体,或基因团;当然也不会与身体和基因团相分离,好像身体只是一个客体,好像自我可以还原为

“灵魂”,如机器里的幽灵,或者还原为理性和选择。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自我是整合的。

知道了我们乃是被造为男男女女并彼此包容,第六点就不能理解了。神要我们在我们的社会性里,即性关系里,模仿他。性在创造中是好的,而且是很好。这是彼此包容的故事:“一个肉体”的男和女的联合,始于婚约,在忠诚中维持,并受福于儿女。“始初时”的美好的性包括互爱和互敬,亲密和一贯,并受福于儿女。

性是好的,但它不是神;因神造的都不是神。这个故事不允许那种对性和生育的极端的偶像式的追求,如果人的完全要依赖于性的完全,或依赖于生育欲的完全,那么,我们就没有读懂这个故事。

性是好的,它一开始就是涉及整个人的。这是“一个肉体”的关系,而不只是自主个体间的契约。承认这是我们的故事意味着不仅要拒绝把自我还原为基因团或分离的选择能力,而且要拒绝把性交归为没有忠诚投入的快感技巧,或对儿女关怀缺乏投入的纯生理的和契约的事情。

我们在婚姻里仿效神是忠诚地自我付出和关心对方及儿女,即使他们的回馈并非我们所指望的(他们的回馈永远都是不合所指望的)。我们可以从“阿爸”的故事里学习做父母。这和那制造完善小孩工程的智慧所提供的父母观不同。做父母的养育之劳是不计报酬的。我们必须使我们能够做这不计报酬的父母养育之劳。引向流产的产前检查便破坏了这一父母之责。<sup>①</sup>

最后,这个创世论还告诉我们,神让我们自由。神是人类自由的源泉和归宿。人类自由过去是现在也是神的礼物。这是好的礼物,由此神便能使人 and 神之间,以及人与人彼此之间,建立自愿的

<sup>①</sup> 我认为,那些证明流产为正当的遗传条件,大概和那些让慈爱父母决定放弃对一个小孩的生命支持的条件差不到哪去。



伙伴关系。凭此我们就可以放弃遗传还原主义的决定论。还有,自由社会工程的智慧认为自由是充足的道德原则。自由是道德生活的前提,但道德生活不能只归结于此;道德可能被自由破坏。解决的办法既不是增大自由,也不是抹消自由。我们必须学会尊重自由。然而,人不止于他们的理性自主性。我们要尊重他人,把他们当作完全的个体,不仅是自由个体而且也是彼此彼此的成员;而且,他们在其中生活也不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决不能用自主性来独占我们的道德倾向。

## 罪

创世当然不是故事的全部。这个故事继续说下去就开始情节复杂化了,这就是人的罪的故事。圣经说,而且说得很清楚,“始初”神造了一切并且是好的。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不好的东西;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自我等都有缺陷。这是无法说清的秘密。然而,圣经说得很清楚,这不是神的过错,也不是自然的错。这错在于我们。这错乃由人的罪所致,乃由于人拒绝信任神感谢神所致。

Reinhold Niebuhr 想用焦盼(anxiety)来解释这个无法说清的秘密。焦盼起于我们既有限又自由这一事实。人同时是自然的有限小孩和灵的自由小孩。我们总是要么否定前者,要么否定后者;比如我们在骄傲中否定我们的有限性,却在感性和性情上否定我们本性上的超越性。<sup>①</sup> 骄傲和性情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可是,在我们的人类工程中,包括人类基因工程,它们却在带领着我们。当我们想通过抹消我们的有限性带来的弱点进而消解我们的焦盼时,骄

<sup>①</sup> 参阅 Mark J. Hanson 的“Indulging Anxiety: Human Enhancement from a Protestant Perspective,”(“在焦盼中:从新教立场看人类强化”),载于 *Christian Bioethics*《基督教生物伦理学杂志》,八月,1999年;第五卷第二期,121—138页。

傲就开始工作了。当我们在人类基因工程中找到了我们的有限世界的缺陷并企图为之提供技术修补时,骄傲就在工作了。当我们要否定我们的自由以逃避责任时,这便是惰情的作用。当我们在人类基因工程中接受遗传还原主义和决定论时,惰情便已在工作。在人类基因工程的运转中,骄傲和惰情缺一不可。然而,骄傲和惰情都是愚昧的。<sup>①</sup>

人的罪会把宇宙搞乱,但神不会让恶得逞。因此,堕落以及大洪水并不是故事的结尾。于是还有神的立约和祝福。

### 故事的中心

我得快点把基督教圣经所告诉的故事的中心说出来。故事的中心是耶稣的故事。关于他的出生,他给自己造了一个人类基因团。他“被怀孕并出生”。究竟为什么这个故事要提起这小小小孩的事呢?人们不必一定要把路加关于出生的故事当作客观的记载,同样可以理解这一事实,即对于路加福音来说拿撒勒人耶稣的传记是从怀胎开始的。当然,耶稣的故事可以从他有了名字并在我们中间被分辨出来之后开始。当然,我们可以说,他的复活故事把他的全部生活,包括在那黑暗的胚胎中的生活,都点明了。即使如此,在这故事中耶稣的个人身份(像身体一样不能与之分离)涵盖了从怀胎到坟墓的另一边,即神的力量那里。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应该对这新生儿抱有崇高的敬意和待以衷心的欢迎。

这个故事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标准来决定谁算是一个“人”。

---

<sup>①</sup> 这故事还有关于自由的本性的智慧。奥古斯丁对自由有极好的理解。他认为自由不是一个中立的个体在追求时作无自我约束的选择,而是一个个体建立自我的能力,即他把自我建立在某种“好”之上,并在选择中认定自己身份,然后在此基础上保持与已定的自我相一致,去追求和行动。这一自由的理解对怎样做父母这个问题的遗传选择很有启发。不过我不抑在这里讨论。参阅 Hessel Bouma 等著, *Christian Faith, Health, and Medical Practice*《基督信仰,健康,和医学实践》,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9年, 182-186页。

但是,这种欢迎的态度可以来帮助我们识别他人的价值,帮助我们把他人的看作人,看作是一个以他自己的方式进入我们生活的“某人”好撒玛利亚人对于那位“半死”的被留在路边的人来说是一位邻居,听过这故事的人都会对这个问题有意想不到的答案:

“谁是我的邻居?”(参看路加福音 10:29—37)<sup>①</sup> 对于那些用来推卸关心他人的责任的问题,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有很多关于耶稣帮助人的故事。耶稣治病救人。这是 Francis Collins 和其他一些人常引用的故事。在耶稣的治病救人中我们真的发现了一些神的事业,即把我们引向侍候他人。神的事业是生,而不是死;神的事业是要人类繁荣,包括我们所说的健康,而不是要人有病。治病是象神的样子,并且也是服务于神的事业的。我们必须去关照病人,去治病救人。

因此,我们要做的是把遗传诊断引向治疗,或遗传治疗。人类遗传工程中有很多可庆贺的事。比如,遗传学有时使我们能够决定哪些药对病人效力最佳,如对付乳腺癌是用常用止疼药如可待因,还是用 her ceptin 这种新药。我们还要祝贺遗传治疗对一些严重先天免疫缺陷(SCID)孩童的成功。<sup>②</sup>

遗传知识和技术要面向“健康”,而不是追求强化。这里的区别不易掌握。但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形象乃是要服务于神的事业,

<sup>①</sup> 见 Oliver O'Donovan 著, *Begotten or Made?* 《生还是造?》,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年, 48-66页;也参阅 O'Donovan 的“Again: Who Is a Person?”(再问一遍:谁是一个人?)载于 J. H. Channer 编, *Abortion and the sanctity of Human life* 《流产和人类生命的圣洁性》, Exeter: Paternoster Press, 出版年月未知, 125-137页。

<sup>②</sup> 参阅 Kenneth W. Culver 关于人类基因团知识应用的精彩研究。“A Christian Physician at the Crossroads of New Genetic Technologies and the Needs of Patients,”(“一个基督徒医生在新遗传技术和病人需要之间的十字路口上”), 载于 Ronald Cole-Turner 著, *Beyond Cloning: Religion and the Remaking of Humanity* 《复制技术的其他问题:宗教和人类的重造》, Harrisburg: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2001年, 14-33页。这种医治的态度不允许任何遗传干扰。按圣经做事的社会需要各人都需要自己的洞察力。肉细胞迁移和修复技术尚无多少成功。但这是有前景的治疗,而且在我看来在研究和运用上不会有新的伦理问题。但是,我们需要注意茎干细胞移植和所谓的复制治疗技术。如何思考这些问题,圣经并没有密码。但是,在讨论和思考它们时,我们需要记起这故事。

我们就需要对此做区分然后才能顺着去做。优生学不是仿效神的路子。培根工程不对健康和强化做区分。它认为自然本身,因其有限性,是一个问题;其使人受苦之处必须用技术来克服。滑稽的是,人类的痛苦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扩展了。圣经的故事提供了两个理由让我们思考这个区别和两种方法去追溯其中的分别线索。

首先,我们要清楚,有限性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对那些追求超越有限的努力表示怀疑。我们是要离开受苦的境况,是要和罪的作用对抗,但我们的有限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依赖性和受限制性是好事。

其次,我们还要清楚,对人类苦难的解救并不仅仅在于技术。我们不该只用技巧来帮助我们。智能告诉我们,要从社会的角度看问题。比如,我们必须防止残疾婴儿的出生这个结论就下早了。相反,我们应努力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能容纳那些不同于我们的人。

耶稣不仅是医生,他还向穷人宣讲福音。在耶稣身上神表明他是和穷人在一起的。圣经不仅提供智能也宣示公正。我们必须循着那穷人的福音走向公正。

铭记这个故事而照着去做就要去关心社会公正,聆听穷人的声音和需要。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公正和自由社会工程的道德低调主义完全不同。它不是一种绷得紧紧的只是去保护个人利益不被他人干涉的公正。在人类基因工程中仿效神,我们就不只注意那些刺激性的技术和科学前沿话题,也要关心那些平凡的公平问题,如 HGP 的社会投资的公平问题和穷人对工程的付出和得益方面的公平问题。如果我们要仿效神,我们就要去仿效他关心那些穷人和陌生人,地位低下和没有发言权的人,以及那些不同于我们及我们的样子(包括遗传上的样子)的人。如果我们要铭记这个故事并照着去做,那么,我们社会的每一成员,即使是最渺小者,都是值

得神的爱护和关怀的。

拿撒勒人耶稣既是医生又是穷人福音的宣讲者,但他的福音是紧紧和十字架的故事联在一起的。耶稣“在彼拉多手下受难”,他在人的悲伤中喊道,“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这悲伤没有掩饰,面对那些另一世界的事他也没有拒绝和退缩。我们也读不到像那些修饰过的故事里的传奇式的减轻疼痛努力。这里也没有预设什么通过统治自然来保障人类福利。十字架的故事提供了这样的纠正剂,它既没有那些否定这个世界的悲伤的宗教胜利者心态,也没有那些依赖技术解决的医学胜利者心态。

面对人类基因工程,这个故事要我们有同情心。我们必须有同情心。不过,我们要注意,不要用现代的伪造品来混淆古时的美德。这古时的美德指的是,神和我们在一起,把人的悲伤哭喊当作自己的哭喊。现代的同情心则要止住哭喊。缺乏和他人一起受苦的意愿,现代同情心是要用一切办法来终止苦难。培根工程培养的同情心是要我们依赖技术来制服苦难。现代“同情心”简单而盲目地用超级技术来装备自己,不是依赖智能而是依赖技巧。这种积极的用技术来对付苦难的热情掩盖了技术的局限性。

错并不仅仅在或不主要在医学上。当基督群体忘却了悲伤时,我们不仅把苦难而且也把受苦者边缘化。当我们在我们的仪式上把悲伤搁置一旁时,我们就指望不再受苦了。于是,在恼怒或荒谬中我们在会众中间孤单地坐着。于是,我们系紧鞋带,努力把自己提起到那胜利气氛里的仪式中;或者去把我们的技术拿起来,努力把自己提起到那免于苦难的地方。

铭记这十字架的故事并照着去做意味着恢复那准备和他人一起受苦的同情心,分享苦难,一起应付而不只是提供工具;用智能而不是技巧来装备这同情心;不靠技术来解决社会问题,不依赖于技术“强化”来回应苦难。

## 故事的结尾

神兴起耶稣。这个故事说的是神在看顾这位教师和医生。如耶稣所说,神在结束罪和死的统治,并在建立神自己的未来。耶稣在我们的世界和历史中——也在我们的基因团中——被兴起,而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基因团都幸运地不能逃避耶稣的规范。

当然,这美好的未来可惜还未到来。但它全在乎神,而不在于我们。我们不是弥赛亚,但耶稣是。我们的技术力量,虽然伟大,却既不能建立这样的城市,也不能提供这样的医学,在那里“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启示录 21:4)

在这个故事里,医生和护士和科学家在履行职责时不会有弥赛亚式的负担。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面对神的恩典并坚信神的未来。基督徒会不断叙说这个故事并努力照着去做,尽管并不“不完全”。

在圣经的故事里,我们找不到那关于人类基因团的编码。但是,那里有智能。我想,但愿我对此提供了些线索,这智能最终需要社会对它的识别。因为基督徒是由这故事来定位和带领的,所以他们会人类基因团问题上去努力识别它。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句话深刻意味:“在我们身上来荣耀神”,也在人类基因团上荣耀神。